

黄才贵 著

贵州

民族文化论丛

· 侗族历史文化研究
· 贵州民族文化研究
· 中日文化比较研究

·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民族文化论丛

黄才贵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民族文化研究/黄才贵编.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4

ISBN 978-7-221-08495-8

I. 贵... II. 黄... III. 民族文化—研究—贵州省—文集
IV. K280.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1108 号

贵州民族文化论丛

黄才贵 著

责任编辑	徐 一
封面设计	熊 锋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1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mm 1/16
字 数	500 千字
印 张	30.75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08495-8/K·1086
定 价	48.00 元

序

我与才贵同志相识的时候,他是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我们一起在大方城关小学发现了明代水西成化大铜钟,还考察了九层衙门。由于他对民族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考试,主动要求到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工作。民族调查是很艰苦的,长年累月,跋山涉水,深入穷乡僻壤,十天半月回不了家。他执著地探索、追求,义无反顾,一干就是二十七八年。调查使他获得真知,加深了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他写下了许多有见地的文章,凝结着他的汗水与心血,这本《贵州民族文化论丛》就是他探索贵州民族文化的见证,是他对贵州民族文化研究的一份贡献。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弘扬民族文化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弘扬民族文化,首先必须有“文化自觉”,没有这种“自觉”,势必在各种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失去“自我”,被湮没在历史的浪潮之中。然而,“文化自觉”必须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只有对自己的文化充满信心,才能更好地去传承它,使之发扬光大。而“文化自信”又来自于“文化自知”,对本民族的文化有“自知之明”,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掌握民族文化的特征,知其短长,察其利弊,以求在新的时代有新的发展。由此看来,深入研究民族文化是弘扬民族文化的基点和先决条件。才贵同志身为侗族,矢志不渝地研究侗族文化和贵州民族文化,正是由“自知”、“自信”到“文化自觉”的表现。

他是一位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侗族学者,因为有很深的侗族情结和记者敏锐的眼光,对侗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有许多的发展和思考。他遍历侗乡,实地考察了侗寨鼓楼,经过归类、比较,揭示了鼓楼建筑的工艺技术与科学含量,阐明了它的美学价值。他的研究没有停留在文化表象上,而是升堂入室,进一步探索鼓楼的社会功能,展开了鼓楼下侗族文明的探讨。他写了《家庭公社》、《合款制度》、《习惯法规》、《社会变革》等文章,从深层次上探索侗族社会,指出“侗族制度文化的精髓是努力构建‘溪峒’环境的和谐社会”。“和谐”是侗族文化的灵魂,鼓楼、风雨桥既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又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合款与习惯法规推进了社区自治,侗族大歌则是“人与山水的和声”。我们要弘扬的,正是这种民族精神,正是这种

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优秀文化传统。

祭祀“萨玛”是侗族普遍的民间宗教活动,它源于古老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世代承袭,延续至今。才贵同志以历史的眼光研究了“萨玛”文化的演变,以新的视角观察祭祀“萨玛”与侗族文化心态,以新的文化取向看待这古老的文化遗产。他写了一本《女神与泛神——侗族“萨玛”文化研究》,从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的角度多方面考察了“萨玛”现象,把“神”还原到“人的世界”,看到了人的精神需求、人的心灵深处以及文化心态。他从“女神”的崇拜中看到了在侗族社会中“女权”的崇高地位,看见了在“泛神”祭祀中体现的“天人合一”思想,看见了侗族文化生长着的“草根”,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探寻而且必须探寻的问题。宗教信仰是一种社会现象,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它作为一种“潜意识”影响人们的思想言行和道德规范,从信仰和习俗上对社会进行调控,因此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必须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发扬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一面,扬弃其“过时”的糟粕,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

黄才贵同志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侗族文化,他的视野拓展到贵州民族文化,并集中关注影响和制约贵州文化发展的制度文化。他写了《民族识别》、《制度文化》、《和合发展》、《屯军后裔》等文章,最终写成了《独特的社会经纬——贵州制度文化》一书。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地区,由于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不同,历史上形成了多种社会制度,如彝族的“则溪”制度、苗族的“鼓社”制度、侗族的“合款”制度、布依族的“亭目”制度等等,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文化风貌也不一样,形成了“多元并存”的文化现象。在研究中,他强调“和合”精神,民族关系的主流始终是和谐发展,民族文化既保持各自的传统又相互交融。

他的研究是开放式的,由侗族文化扩展到贵州文化,进而从事中日文化比较研究,把贵州民族放在国际大环境中来作考察,加深对21世纪民族文化的“国际理解”。他很早就关注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贵州民族文化的调查,著有《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的贵州人类学研究》。他有机会与日本学者合作,开展了许多研究活动,尽可能进行中日文化比较研究。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许多变异。干阑式建筑不仅在中国南方民族中很普遍,在贵州、在日本有多种变迁,这与稻作民族关系密切,但又因地理、历史、文化诸种原因也有差异。他在《油茶与茶道》一文中,阐述了中日茶源相同、茶理相同,日本的“茶道”实由中国的茶文化发展形成,侗族油茶的“末茶”即日本“茶道”中的“抹茶”。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在历史长河中不同文化之间总要进行交流,在世界各国

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更应该重视各种文化的交流与对话,这种研究方法颇具创新精神。

黄才贵同志的《贵州民族文化论丛》,有理论,有实践,有新的理念,有新的视角和观点,由微观逐渐走向宏观,由贵州而走向世界,是一本很有新意的好书,值得认真一读。

史继忠

二〇〇八年十月九日

跟进的足迹

“2008”是极不平常的一年,是大灾、大难与盛世、盛典交汇的一年,它标志着我国民族文化复兴的新起点。伴随着祖国改革开放和日益兴盛的步伐,笔者也走过了自己事业的发展之路。

为迎接科学春天的到来,1980年在贵阳召开了首届民族学研究会。笔者以《族源初探》之初作冒昧参会,幸得专家们的好评,从而离开了工作10年的新闻界,一头栽进深不可测的学术界。20余年来,大致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侗族历史文化研究,二是贵州民族文化研究,三是中日文化比较研究。围绕这三个专题,共选出35篇文章,按刊载的时间顺序排列,并作适当归类,反映了笔者当时的跟进思路和相关课题运作及专著编写的过程。

一、侗族历史文化研究

选有16篇文章。其中,属侗族历史方面研究的有《族源初探》、《五溪向氏》、《民族名称》、《民族关系》四篇文章,反映了笔者进入新的工作岗位,在参加“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侗族简史》编写过程及前后所思考的问题点,基本上是围绕侗族族源来展开讨论。根据历史文献和侗族民间口述史的研究,认为侗族源于我国古代百越族群中的“西瓯骆”,在特定的“九溪十峒”或“九溪十八峒”的“溪峒”环境中,经过秦汉、唐宋、明清几个较大历史阶段的融合发展,逐渐形成单一民族,并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侗族文化。

属侗族物质文化方面研究的有《住居空间》、《鼓楼研究》、《鼓楼美学》、《文化位移》和《溪峒品牌》五篇文章,反映了笔者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对侗族文化特质的认识和对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为发展“溪峒”经济,全面建设侗乡的小康社会服务,展开了文化经济学领域的研究。

属侗族制度文化方面研究的有《家庭公社》、《合款制度》、《习惯法规》和《社会变革》四篇文章,通过理论和社会实际的研究,揭示了侗族传统制度文化的精髓是努力构建“溪峒”环境的和谐社会,为进一步对全省世居民族制度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属侗族精神文化方面研究的有《宗教遗迹》和《堂萨性质》两篇文章,揭

示了侗族传统宗教信仰的对象是祖母神和泛神;又以民族学和妇女学相结合的方法对《侗女的田地》作了进一步研究,为后来撰写《女神与泛神——侗族“萨玛”文化研究》(列入“贵州民族宗教文化研究丛书”,得到2004年贵州省出版发展专项基金资助。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奠定了基础。

在侗族历史文化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与同仁一起,还主持完成了列为国家“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民族文化大观·侗族篇》的编写任务。

二、贵州民族文化研究

选有11篇文章。其中,属贵州民族制度文化方面研究的有《民族识别》、《制度文化》、《和合发展》和《屯军后裔》四篇文章,是在与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专家学者建立共同研究课题的基础上展开的讨论;同时又得到省领导和专家学者的厚爱、指导,形成了对全省世居民族制度文化的研究,列入“贵州文化系列丛书”的《独特的社会经纬——贵州制度文化》(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属贵州民族文化保护发展方面研究的有《生态博物馆》、《村寨调查》、《南方长城》和《前沿科学》四篇文章,立足于本省民族文化资源丰厚的实际,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课题和全省民族村镇保护与建设的展开,进行了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探索,为后来参加全省民族村镇保护与建设工作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属贵州民族文化经济发展方面研究的有《村镇旅游》、《文化板块》和《夜郎主题园》三篇文章,试图探讨在社会转型时期怎样构建贵州文化板块和建设具有贵州民族文化特质的主题公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日新月异的生活追求,为后来参加全省的一些旅游规划建设活动以及旅游管理方面的高校教学活动奠定了基础。

三、中日文化比较研究

以广深的眼光看待“他民族”所构建的“他文化”即自己“传统文化”的发展变化,已成为加深对21世纪民族文化的“国际理解”。为此,特选了八篇文章。其中,属贵州民族文化方面研究的有《鸟居调查》、《贵州学问》和《同一性研究》三篇文章,主要介绍近百年来日本学者对我国特别是对贵州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成果,为后来的编著工作奠定了基础。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帮助下,在省文化厅、省民委和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各位领导的支持下,出版了《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一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属贵州民族物质文化方面研究的有《干阑民居》、《中日干阑》和《油茶

与茶道》三篇文章,主要介绍日本学者对我国特别是对贵州民族住居文化和饮食文化的调查研究成果和笔者的研究心得。

属文化视野方面研究的有《学术文化》和《对外视角》两篇文章,主要介绍日本学者对我国特别是对贵州民族文化调查研究的延续性成果及人们对世界各国民族文化的态度。

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工作,有分有合也有内在联系,都是围绕贵州民族文化。为了适应人们当今短、平、快的生活节奏需要,特将文章原来的题目作了简缩。又为使读者便于查找,特对原文出处作了说明。由于文章内容自成一体,与其它篇比较,难免有重复之处;而且刊文格式基本保留原状,表现为多样性,请读者见谅。收入本论丛的文章,大部分曾在省内外刊物或文集中公开发表,也有几篇曾在海外刊物公开发表,有的还被长期生活工作在国外的专家翻译出版。由于笔者的学术功底浅薄,原刊文章存有不妥之处,这次收集成册时作了必要修正,仍请读者不吝赐教。

在以往的研究工作中,难免留下一些遗憾。因当时收集的资料有限,分析水平不高,论述总有欠缺。近年,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发掘整理,又有一批鲜为人知的资料问世,但在本文集中难以增补,留待以后继续研究。还有一些课题,刚开始思考,也期望来年再向读者求教。

本论丛的出版,全仰贵州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鼎力支持和帮助,特表示衷心感谢。

拙著在出版之际,承蒙史继忠老师的指导并写《序》鼓励,特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此,还要感谢海内外相关单位领导、老师、同仁、同事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感谢相关调查地父老乡亲 and 兄弟姐妹们的支持和帮助,感谢读者多年来的支持和帮助。

作者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九日于安云路

目 录

序	(1)
跟进的足迹	(1)

侗族历史文化研究

族源初探	(1)
五溪向氏	(16)
习惯法规	(26)
民族名称	(39)
宗教遗迹	(50)
鼓楼研究	(57)
合款制度	(74)
家庭公社	(81)
堂萨性质	(95)
民族关系	(107)
社会变革	(122)
住居空间	(132)
侗女的田地	(159)
鼓楼美学	(195)
文化位移	(206)
溪峒品牌	(219)

贵州民族文化研究

民族识别	(227)
制度文化	(239)
文化板块	(258)
和合发展	(268)
村镇旅游	(312)
村寨调查	(322)
南方长城	(336)
夜郎主题园	(348)
生态博物馆	(364)
屯军后裔	(373)
前沿科学	(384)

中日文化比较研究

油茶与茶道	(394)
干阑民居	(404)
中日干阑	(416)
鸟居调查	(432)
同一性研究	(437)
贵州学问	(445)
对外视角	(456)
学术文化	(467)

族源初探

原题《侗族族源初探》，为1980年在贵阳召开的中国首届民族学研究会撰写的论文，载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三集，民族出版社1982年5月版。

壮侗诸族属于我国古代瓯越的后裔，这已得到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公认。但是，壮侗诸族各自源于瓯越的哪一支，有无迁徙活动，在何种情况下形成单一民族？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笔者以侗族为例，对以上问题试作探索。

汉代五溪地区的武陵郡阳山一带，无阳县、鐔成县和牂牁郡的且兰、毋敛两县的部分地方，都可能是侗族先民活动的区域。长江支流的沅江，古称沅水，其上源甚多，史有“五溪”称谓。刘昭引《荆州记》说：“（临沅）县南临沅水，水源出牂牁且兰县，至郡界分为五溪，故云五溪蛮^①。”战国时期，楚、秦政权相继进入这个地区；楚为商于，秦为黔中^②，这里的人们还保持着古代村社共同体的原始形态；史籍统称该地民族为“黔中蛮”，西汉时改黔中郡置武陵郡，又称为“武陵蛮”，东汉时沿置武陵郡，后改称“五溪蛮”。黔、湘、桂、鄂四省（区）毗邻的地区，现今侗族聚居的黎平、天柱、锦屏、榕江、从江、玉屏、芷江、新晃、通道、三江、龙胜等县，分布的剑河、三穗、镇远、雷山、荔波、独山、会同、洞口、城步、融水、融安、罗城等县和散居的来凤、咸丰、宣恩、利川等地，有半数处于五溪流域。历史上所称的“黔中蛮”、“武陵蛮”和“五溪

① [晋]司马彪撰：《后汉书志·郡国四》卷二十二。（中华书局，下引二十四史同）

② [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巴志》卷一：“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于地为黔中郡。”（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蛮”中的一部分居民,可能与侗族先民有关。

西周时期,楚国势力还没有到达今湖南境以前^①,这里是瓠越和其他族群杂处的地方。在周夷王之时,楚越常发生战争,出现了“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的情况^②。到楚悼王时,楚国的力量发展到了今湖南的南部和西部^③。瓠越遭受攻击后,使得这个族群发生了变化,有的融合了,有的迁徙了,只有一部分在原地山区留下。战国末期,今湖南西部的瓠越则被称为“区”。《逸周书·王会解》卷七就记载了“区阳以鳖”的活动。区即瓠,有隐匿之义^④。商秦时期,就常称瓠越的支系为欧、瓠、沔或区;到唐宋时期,则通称侗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居住的地方为洞(溪洞或山峒),均以他们居住的山林险阻之地而论。王念孙引《荆州记》说:“武陵郡西有阳山。”武陵郡治所,西汉时在今湖南溆浦,东汉时移今常德。这里的阳山,应在溆浦西。《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一:“卢溪县(今湖南泸溪县)武德三年析沅陵置。有武山。”西汉时,武陵郡西有无阳县,其县名可能与武山和阳山有关;今沅江上游的溆阳河名,也可能与此有关。在楚国势力未到达两山时,“区人”很可能是今溆浦、泸溪一带的土著居民。《隋书·南蛮》卷八十二:“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蛮、曰獠、曰獠、曰獠、曰獠,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獠,今为僚,与越关系密切,魏

①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楚世家》卷四十:“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阳。”丹阳在今湖北枝江县西,是时正西周初年。同书还说:“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郢。……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楚势力沿江东进,仍不出今湖北境,时值西周晚期。

② 《史记·楚世家》卷四十。这里说的“夷”,可能是指苗、瑶先民,“越”则是对江南瓠越的总称。先秦《逸周书·王会解》卷七:“东越海盒,欧人嗽蛇……於越纳,姑妹珍,且区交蜃,共人玄贝,海阳大蟹,自深桂,会稽以輶……区阳以鳖……路人大竹……扬蛮之翟,仓吾翡翠……”这里列举了13种人或地区,皆属于越人或越人所在地。在伊尹为四方献令中说:“臣请正东……沔深,九夷,十蛮,越沔,鬻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鞞,鰓鰓之鼈,利剑为献。”又有:“正南瓠,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玕,璆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这里多为百越族群。(见清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光绪三年三月湖北崇文书局开雕本)

③ [东汉]高诱注:《战国策·秦三》卷五:“吴起为楚悼王,罢无能,废无用……南攻杨越,北并陈蔡。”同书卷十四:“苏秦为赵合纵说,楚王曰:……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阴之塞郢阳,地方五千里。”(上海中华书局据士礼居黄氏覆刻川姚氏本校刊)

④ [晋]杜预注:《左传·昭公七年》卷四十四:“作仆区之法。”孔颖达疏引服虔云:“仆,隐也;区,匿也,为隐。亡人之法也。”(上海中华书局据阮刻本校刊)

晋时武陵、五溪蛮中出现了“獠”的民族称谓。“武陵郡隋图经及贞观地志并言：刘蜀所置酉阳，为汉酉阳……自永嘉之后，没于夷獠”；又有“杂居溪洞，多是蛮獠”^①。沅水上游也有“獠人”居住。〔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叙州下引《荆州记》：“舞溪，獠獠之类。”舞溪即无水，在汉武陵郡无阳县境，“首受故且兰，南（东）入沅”^②。后来，这里的居民被称为“尚人”。〔明〕田汝成在《行边纪闻·蛮夷》中说：“尚人，一曰尚蛮，散处于牂柯、舞溪之界，在辰、沅者尤多。”在同一地望，不同时代，族称各异，“蛮獠”、“獠獠”和“尚人”可能有直接关系。尚人是对今侗族的称呼，在舞溪流经湖南的芷江、新晃两侗族自治县、贵州的玉屏侗族自治县、三穗、岑巩和镇远等地，至今仍是侗族居住的地方。据调查，一部分侗族集镇或大的村寨，都有关于“武陵”的民俗遗迹。在贵州省委统战部工作的侗族老干部龙贤昭说：1949年以前，侗族地区有许多人家，以“武陵世第”的匾额横挂大门上，示意自己的祖源。天柱县城西的岩寨侗族，1949年以前一直使用这种匾号。黎平县城健康路12号的大门上，至今还遗留着“武陵世第”四个楷书大字。

武陵郡南有潭城县，“康谷水南入海。玉山，潭水所出，东至阿林入郁……”^③，此外还有“沅水（山）出象郡潭城西入东注江，入下雋西，合洞庭中”^④。这个县水上交通方便，可能是古人东往南来的走廊。今湖南的靖州、会同、通道，贵州的天柱东南部、锦屏、黎平、榕江北部和广西的三江北部，正处于故潭城县境，是侗族人民长期居住的地方。秦始皇时，曾“使慰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潭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又以卒凿渠（今灵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⑤。潭城之岭与秦时象郡的潭城县相关，刘安注：“潭城在武陵西，南接郁林。”这里是“呕”或“瓠人”的分布地是可能的。唐宋学者所考秦汉时“瓠人”活动的地域，基本与秦汉时文献记载相符。〔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地理志》卷四十一：党州（今广西玉林县境）“古西瓠所居。秦置桂林郡，汉为郁林郡。”〔宋〕罗必纂《路史·郡国纪》卷丙：“郭璞以建安为西瓠，非此集韵音，呕骆越别种。”又引“《郡国志》：郁林西越也。故

① 〔宋〕史乐撰：《太平寰宇记》卷一二〇。

② 〔东汉〕班固撰：《汉书·地理志》卷十二。

③ 同②

④ 《山海经·海内东经》沅水条卷十三。（见《御览山海经笺疏》，光绪五彩公司石印本）

⑤ 〔汉〕刘安撰：《淮南子·人间训》卷十八。（中华书局聚）

杜佑云:西瓯,即言西以别东尔。《寰宇记》:郁林废,党州经善劳县,即古西瓯居。”秦时,在这个“瓯骆”中心区开三郡;汉武帝时,则为南越控制;此后,“瓯骆”之称在文献中基本消失,被改称为“獠”。〔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三五六引晋人郭义恭《广志》曰:“獠在牂柯、兴古、郁林、交趾、苍梧,皆以朱漆皮为兜鍪(古盔名)。”唐代,对今黎平、榕江一带侗族居住的地方称为“夷獠”。《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三说:“古州乐兴(古)郡下。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李弘节开夷獠置。”〔唐〕杜佑《通典·岭南序略》卷一八八还说:“蛮獠又据象郡。”到明代,文献仍然对今黎平、锦屏、通道一带的侗族,直接称为“蛮獠”^①。显然,这些地方的“獠”,都可能与今侗族有关。所以,〔明〕邝露《赤雅》卷一在记录今广西北部侗族时说“獠亦獠类”、“獠之有獠”。

《汉书·昭帝纪》卷七记载:“元凤五年(前76年)秋,罢象郡,分属郁林、牂柯。”牂柯郡本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且兰后设置,象郡分属牂柯只有几县。其中的毋敛县“刚水,东至潭中入潭”^②。刚水即今都柳江,流经武陵郡潭城县境西;潭中属郁林郡,在今广西柳州市,潭水即今广西融江。毋敛县是故夜郎疆域的一部分,包括今广西宜北,贵州榕江西、从江、荔波、独山、都匀等县地方。《华阳国志·南中志》卷四记载:“庄蹻泝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且兰在今清水江、潯阳河发源地一带,与武陵郡的无阳县邻,它和毋敛县的东部,地处五溪地区的西南边沿。《华阳国志·南中志》还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南中有七郡,包括牂柯在内,是夷越杂处的地方。西汉时,设置牂柯郡的夜郎国,其南界接南越。南越“迺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并“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③。看来,牂柯之越乃“瓯骆”,后来也演变为“獠”。〔宋〕范曄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八十六说:“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之立

① 〔清初〕傅维麟撰:《明史·湖广土司》卷三百:洪武“十八年,五开蛮吴面儿反,势厥甚。命楚王桢将征虜将军汤和,出斩九溪诸处蛮獠……”“九溪诸处”与侗族历史上的“九溪十八洞”相关,是今侗族聚居地方。吴面儿即吴勉,是这里的兰洞人。至今,这一带侗族人民还流传着许多关于吴勉的神话故事。

② 《汉书·地理志》卷十二。

③ 《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

后。”《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叙州下引《荆州记》还说：郎溪县^①“沅溪水，西南自獠界流入。”沅溪水，即今清水江。这里说的“獠”，可能与侗族有关。西汉末年，“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邈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奉献。光武嘉之，并加褒赏”^②。谢氏是牂柯地方少数民族的主要首领之一。到唐时故夜郎地仍有三谢蛮，其中东谢蛮的首领就是谢元深。“贞观三年（629年），其酋元深入朝……帝以其地为应州，即拜元深刺史，隶黔州都督府”^③。〔民国〕《贵州通志·舆地志》又说：应州，“贞观三年以东谢首领谢元深地置，初为下州，天宝三载降为羁縻，县五：都尚（今都匀）、婆览（今三都陈蒙烂土之水婆）、应江（今榕江）、陀隆（今台江）、罗恭（今雷山之雷公坝）。”榕江固然是侗族长期居住的地方，而都匀、陈蒙烂土散居有侗族是可能的，元代文献确有记载^④。唐代，在五溪地区设有业州（巫州）夜郎县^⑤和龙标夜郎县^⑥，现均为侗族居住地方，这可能与古夜郎居民的后裔有关。五溪地区夜郎县名的得来，也可能与此情况类似。唐思王县在今思南、沿河一带，在元、明两代仍有侗族居住^⑦。古夜郎极盛时期扩展到了五溪地区，这里的居民可能是今侗族的一部分。田汝成说，尚人散处牂柯、舞溪之界，就反映了这样的历史情况。

① 〔清光绪〕庞际云撰：《湖南通志·地理志》卷二十四《黔阳县》条：“郎溪在（黔阳）县西南，自靖州、会同县流入县界，至托口入沅水，一名郎江，一名渠水（《大清一统志》）。郎溪县，贞观八年置，因溪为名（《元和志》）。”〔民国〕任可澄等纂：《贵州通志·舆地志》：郎溪县，西汉时属武陵郡潭成县地。唐贞观八年置，属巫州，实通管今湖南靖州、会同、通道和贵州天柱东南部地区。

②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八十六。

③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南蛮传》卷二二二（下）。

④ 〔明〕宋濂等撰：《元史·本纪》卷十六：“洞蛮烂土立定云府”。同书卷十七：“定云洞蛮酋长来附。”这里的“洞蛮”包括有侗族在内，现今的三都、都匀的一些地方，仍有侗族居住。

⑤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地理志》卷四十《业州下》条：峨山县（今湖南新晃及贵州镇远北部）“贞观八年，置夜郎县，属巫州。长安四年，置舞州。开元二十年，改夜郎为峨山县。”

⑥ 《旧唐书·地理志》卷四十《巫州下》条：“贞观八年，分辰州龙标县置巫州。其年，置夜郎、朗溪（渭溪）、思微三县。”〔清〕张澍纂：《续黔书·夜郎》卷三：“今黎平、镇远为龙标之夜郎县也。”（光绪丁酉年刊于贵阳书局）

⑦ 〔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輿纪要·贵州三》卷一二二：思南府“朗溪蛮夷长官司，府东四十五里北至沿河司二百六十里。唐贞观八年置郎溪县属，坐州今湖广沅州也，后没于蛮。元为朗溪洞，洞人，犵獠据此。”

总之,据文献记载,五溪地区早在秦以前就有了“呕”或“瓯人”居住,魏晋时期演变为“獠”、“獠獠”,后来又演变为“猯”;三者均为辱称,其间可能存在着同一族系的渊源关系。



长江以南,五岭东西,主要是“瓯越”居住的地区,此外还有一部分越族散居其他地方。由于瓯越支系众多,古有百越之称。早在战国末期,就有了“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的记载^①。可见,今江苏、浙江、福建、台湾、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及越南北部等地,都是百越活动的区域。生活在五溪地区的“区人”,史籍上还没有见到他们外迁的活动。相反,史籍和民间传说,都叙述了分布其他地区的瓯越支系及其后裔曾迁入五溪地区,给原来的“区人”居民及其后裔增加了新的血液,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与今侗族的大分散、小聚居,形成内部互称“晋僚”(Jeml laox)、“更佼”(Gaeml jaox)、“晋饯”(Jeml tanx)的三个支系,语言上分为南北两个方言区,并各有三个土语区的格局是相联系着的。

“吴越之蛮”西迁

楚国的西北面是巴国控制的地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卷九十五颜师古注“巴、黔中”时说:“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巴国强盛时,最南面已扩展到了今四川东南,贵州东北和湖南西北地方,伸进了五溪地区。在巴国境内,除了巴族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华阳国志·巴志》卷一说:“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獠、夷、蛮之蛮”。除“共”和“奴”的族属外,童恩正先生都作了详细的考证^②。关于“奴”的族属,徐中舒教授认为是“僚”^③,任乃强教授认为是“卢”^④。关于“共”的族属,《逸周书·王会解》早有“共人玄贝”的记载,孔晁注:“共人,吴越之蛮。”作为语音,吴太伯奔荆蛮,“自号句吴”^⑤，“句吴”急读就是“共”音;作为地名，

① [战国末]吕不韦主纂:《吕氏春秋·恃君览·训解》卷二十。

② 童恩正著:《古代的巴蜀》第五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③ 徐中舒著:《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思想战线》1978年第2期。

④ 任乃强著:《羌族源流探索》下篇,见中国民族学会编《民族研究通讯》1980年第1期。

⑤ 《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卷三十一。